

宋一夫◎主编



变化



中华

文化

范畴普及读本·兵学



吉林文史出版

宋一夫◎主编

中华

文化
范畴普及读本·兵学



变化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变化/宋一夫主编.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4. 8 (2009. 6 重印)
ISBN 978—7—80528—063—9

I. 变... II. 宋... III. 历史故事—作品集—中国 IV. I247. 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74360 号

Bianhua

变 化

主 编 宋一夫

责任编辑 于永玉 张雪霜

封面设计 徐 超

出版发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印 刷 北京市飞云印刷厂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字 数 83 千字

版 次 1994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 5 001—10 000 册

印 张 4

书 号 ISBN 978—7—80528—063—9

定 价 20. 00 元

子規啼血喚東風（代序）

文字作者：宋一夫 吕庆业 洪 光

王 茵 冯 晖

人的生命是短暂的，但人的思想是永恒的。人要在有限的生命中，创造出无限的价值，这是人生的最高追求。本书就是作者们思想的结晶，是他们对生活的感悟和对未来的展望。

中国古代的读书人与中国近代的读书人，他们有着不同的追求。中国古代的读书人追求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中国近代的读书人追求的是“科学救国”。本书就是作者们思想的结晶，是他们对生活的感悟和对未来的展望。

本书是作者们思想的结晶，是他们对生活的感悟和对未来的展望。本书是作者们思想的结晶，是他们对生活的感悟和对未来的展望。

面对当前这一复杂多变的形势，我们应当如何面对？本书是作者们思想的结晶，是他们对生活的感悟和对未来的展望。本书是作者们思想的结晶，是他们对生活的感悟和对未来的展望。

子规啼血唤东风（代序）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文化的发展是无限的，人类社会的进步，归根结蒂是文化的进步，是文化底蕴的枯涸与丰润。

中国古代的进步与中国近代的落后，致使清醒的仁人志士从五四时期起，就以其沸腾的热血和竭力地呐喊，要求中华民族文化的重新构筑，从那时起，这种要求愈来愈强烈了。

即将呈现给您的《中国文化范畴普及读本》就是我们全体编著人员，为重构中国文化而进行的潜心尝试。

面对案端一叠叠隽永的书稿，一幅幅精美的图画，集编辑和作者于一身的我们，激动之情难以平抑。同时，另一种思虑也油然而生。据新闻出版署统计，1992年我国出版图书八万种以上，而1993年则达九万种。按图书品种来说，我们早已进入图书出版大国的行列，可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分析，我国又是新版图书最没有信息量

的几个国家之一。大量图书选题陈旧、内容重复已成为当前图书出版事业的一大痼疾。那么，我们推出这套《中国文化范畴普及读本》，是文化的精品，还是在制造精神垃圾呢？

扪心自问，出版这套《中国文化范畴普及读本》，从主观上，著述者绝不仅仅为了一千字、一幅画几十元的稿费，出版者也绝非想的只是经济效益，想从读者腰包中掏出百八十元钱，而是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使然。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近五千年的文明历史，就其文化典籍之多，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无与伦比。可就现今中国来说，尚存在着大面积的文化沙漠地带。据有关普查资料，12岁以上人口中，有2.35亿人属于文盲或半文盲，就是说在我们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文盲或半文盲。据联合国有关组织的资料，世界成年人中的文盲人数为8.24亿，而我国竟占了近三分之一。文盲意味着愚昧、无知、落后与丑陋。没有文化根基的民族是没有灵魂的民族。不使中国人整体文化素质大幅度提高，而去企盼经济的腾飞，只能是善良人的美好愿望。

中国人之所以是中国人，不仅仅是黄皮肤、黑眼睛，更重要的是中国文化。一个无知的、对本国文化毫不了解的人，不管他是大腕，还是大款，说他是中国人，但他决不是鲁迅所讲的“民族脊梁”的中国人。这种中国人决不能成为中华民族的再度崛起而肩负起历史与现实使命

的人。

尤其是我国改革已进入十分关键阶段，市场经济使人们看到了它会给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带来繁荣，但也会使已习惯于计划经济生活的我们，心态发生强烈的震撼。新价值观念与道德意识的冲突，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间的矛盾，像钟摆一样失衡于人们中间，引起人们种种的彷徨与困惑。当我们理智地对待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却从历史当中找到了另一个答案，那就是与我们毗邻的日本和韩国在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他们是在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外来文化才逐步平稳发展到现代化社会。而日本和韩国的传统文化，是大量地吸收和保存了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和反省。

中国人跻身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其立足点无非是过去的中国和现今的中国。今天的中国是传统中国的延续，现代的中国人是传统的中国人的承传。同中国和中国人相伴而生结伴而来的中国传统文化，随着时代的变迁，也不断地凝聚，不断地消失，不断地更新，是一个不断分析扬弃和综合利用的无限进程。也正是这样一个无限进程，才使中华民族代代繁衍生息，使中华民族最终在世界先进民族之林获得比现在更为殊荣的地位！

也正是基于此，我们才撰写和编辑出版了这套《中国文化范畴普及读本》。我们将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生到流变，进行有重点、有区别地纵横向梳理。我们所说的文化精华

既指作为某种文化思想体系的基本内核或精髓，这是我们必须了解的；同时也指作为人类进步的思想观念或行为规范，至今仍有着重要意义，这是我们应该承传发扬的。我们在撰写与编辑过程中，既注意传统文化的精华性，又确保传统文化的完整性和科学性，以及采用故事和图画以达到文化的普及性。既要体现精华，又要考虑不使文化体系支离破碎，既要照顾到“阳春白雪”，又要想到“下里巴人”。这些，均颇费我们的心血。

当然，对任何一种传统文化，其固有价值与现实的实践价值存在明显的二律背反，这或许使有的人感到传统文化是一种过时的束缚，但是，当我们赞叹现代意识进步时，又有哪一株当代文明的参天大树不是根植于传统文化精髓的沃土之中呢？我们不去僵化地恪守传统文化，而要用渊远流长、营养丰富的文化精华，去激发中华民族昂然崛起的生命冲动……

“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相信我们这套《中国文化范畴普及读本》，能在民族文化的优化和重构中成为一种催化剂。如此，我们也就无愧于国人，不负自己。

是为序。

“变化”学说的解析

“变化”一词，在我国的语言中出现颇早，《周易大传·乾卦》里就有“天道变化，各正性命”的话，孔颖达疏曰：“变，谓后来改前，以渐移改，谓之变也；化，谓一有一无，忽然而改，谓之化也。”后来泛指事物的生灭转化。今天则是在“事物在形态上或本质上产生新的状况”这一意义上使用“变化”一词的。

兵家向来看重变化，因为战争中矛盾着的现象不是固定不变的，总是会发生变化的。善用兵者，从不循规蹈矩、墨守陈法，而是根据具体情况，从当时、当地的客观实际需要出发，做出特殊的处置，不拘常法，随机应变，什么样的行动合适就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或随敌变而已变，或以不变应万变，或以己之先变而制敌之后变，或示敌以变而实不变。

变化，是《孙子兵法》的核心，十三篇中几乎无处不讲变化，只是论述的角度不同而已。孙子说：“兵者，

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以不能，用而示之以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计篇第一》）这里强调用兵是一种奇诡的行动，要运用各种手段调动敌人，使其发生变化，由优势变为劣势，由主动变为被动，而已方或声东击西，或出以假象，总是在变化中牢牢掌握用兵的主动权。孙子说：“善用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终而复始，日月是也；死而复生，四时是也。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势篇第五》）奇，就是诡谲，就是变化。这就要求每次作战都要有所变化，既不能墨守前人，亦不能因袭旧法，方能出奇制胜。声、色、味的变化是无穷的，善战者的变化亦应是无尽的。孙子说：“故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者也。”（《军争第七》）“诈”即奇异多变。自古以来，兵家多用诈，时时变换战术、战法。《韩非子·难一》：“战阵之间，不厌诈伪。”所讲的也是这个意思。至今，“兵不厌诈”，已形成成语，为人们所常用。孙子说：“故将通于九变之利者，知用兵矣；将不通于九变之利者，虽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治兵不知九变之术，虽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九变第八》）九变，无穷的机变。孙武认为将帅只有根据

各种特殊的情况和临时发生的种种变化，临机应变，采取适当的措施，方能善于利用地形，得人之用。孙子说：“故兵表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虚实篇第六》）孙武以水形喻兵势，认为要做到用兵如神，须依敌情变化而变化。

相传为司马穰苴撰写、经过后代学者辑补的兵书《司马法》，在许多篇章讲到了灵活用兵，适时变化。《天子之义》篇中说：“兵不杂，则不利。长兵以卫，短兵以守。太长，则难犯；太短，则不及；太轻，则锐，锐则易乱；太重，则钝，钝则不济。”这里专讲运用兵器的变化，从形制的长短轻重上，强调兵器应错杂使用，互为照应，不专一种，各扬其长。《定爵》篇中说：“凡战，权也。斗，勇也；阵，巧也。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废其不欲不能。于敌反是。”权，就是变通、机变。作战要善于变化，布阵要巧于变化。至于“见物则侔”，“见物则卒（猝）”，“凡阵，行惟疏，战惟密，兵惟杂”（以上均见《定爵》）。“无复先术”（《严位》）“凡战，众寡以观其变”，等等，无不是从装备、设阵、行军、作战，使用兵器诸方面论述变化的。

《吴起兵法》中的第五篇《应变》，专门论述如何对付突然发生的种种变化。吴起根据敌情的不同，提出了不同的应变措施。当魏武侯问到“敌近而薄（迫）我，欲去无路，我众甚惧，为之奈何”时，吴起回答说：

“为此之术，若我众敌寡，各分而乘之。彼众我寡，以方（靠拢）乘之。从之无息，虽众可服。”

《孙膑兵法》提出了因地、因敌、因时、因情况之不同，灵活地使用兵力，变幻地运用战法，出其不意，以奇制胜。孙膑朴素地看到了事物是可以向相反的方向转化的，他说：“有生有死，万物是也。有能有不能，万生是也。有所有余，有所不足，形势是也。”（《奇正》）他又指出：“积疏相为变，盈虚相为变，径行相为变，疾徐相为变，众寡相为变，佚（逸）劳相为变。”（《积疏》）善战者就要把握住矛盾的转化，争取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态势，在变化中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孙膑还看到了战争中没有永恒不变的有利形势可以凭恃，所以他见齐威王时说：“夫兵者，非士（恃）恒势力。”（《威王》）因而也不能用一种固定不变的法去对付各式各样的敌人，强调“形者，皆以其胜胜者也，以一形之胜万形，不可。”（《奇正》）而要兼用“谋”、“诈”：“谋者，所以令敌无备也；诈者，所以困敌也。”战国中期，由于生产的发展，物质条件的改善，战场上不但有徒兵、车兵，还有大量的骑兵、弩兵。孙膑看到了阵法的运用占有着特殊的地位。《十阵》一篇讲述“方”、“圆”、“疏”、“数”、“锥行”、“雁行”、“钩行”、“玄襄”、“火”、“水”等十种阵法的性能和应用，这本身就表明布阵须因敌、因地而变化。而在运用其中一种阵法

时也要千变万化，如：“凡疏阵之法，在为数丑（群类），或进或退，或击或毅，或与之征，或要（邀）其衰，然则疏可以取阅（锐）矣。”孙膜还看到变化在用兵作战中的重要作用，在《势备》篇中，他以剑、弓弩、舟车、长兵作比喻，颇为具体地分析阵、势、变、权四者的关系及其不可或缺的作用，最后得出结论说：“凡兵之道四：曰阵，曰势，曰变，曰权。察此四者，所以破强敌、取猛将也。”

《尉繚子》中的《攻权》篇说：“故众已聚，不虚散；兵已出，不徒归。求敌若求亡子，击敌若救溺人。”求敌和击敌要有不同的态度，战法自然也应不同，只有灵活对待，变换方式，方能取胜，巧用两个通俗允当的比喻，把深奥的哲理说得十分透彻。在布阵方面，《尉繚子》继承了《孙膜兵法》中阵法须变化的思想，即使是“常阵”，亦应不拘一格，富于变化，《兵令上》中说：“常陈（阵）皆向敌，有内向，有外向，有立陈，有坐陈。夫内向，所以顾中也；外向，所以顾外也；立陈，所以行也；坐陈，所以止也。立坐之陈，相参进止。”

先秦诸子百家中，虽非兵家之作，亦多有论及变化思想的，如《老子》、《庄子》、《论语》、《孟子》等，而《商君书》中的《战法》篇，《吕氏春秋》中的《决胜》、《不侵》、《长攻》等篇，《荀子》中的《议兵》，《韩非

子》中的《存韩》等篇，《战国策》中一些策士的议论，则直接论述军事问题，其中亦不乏涉及变化之说的。如：“凡兵，贵其因也。因也者，因敌之险以为己固，因敌之谋以为己事。能审因而加胜，则不可穷矣。胜不可穷之谓神，神则能不可胜也。夫兵，贵不可胜。”（《吕氏春秋·决胜》）这里强调了根据敌情变化而改变自己决策的思想。而其中的“神”，虽然如同今日所说的用兵如神，但也包含着云谲波诡、变化莫测之意。

一般认为成书于西汉末年的《黄石公三略》，在阐释军事思想时，有些节段论述变化原则，颇为精要。比如：“端末未见，人莫能知。天地神明（指奥妙），与物推移。变动无常，因敌转化。不为事先，动而辄随。”又说：“圣人存之，动应事机。”（《上略》）说的都是军情变化无常，用兵则要随机应变。在论述军事上要注重变化之时，还谈到了君主对将帅、辩士、军卒等也要使用变化之策：“德同势敌，无以相倾，乃揽英雄之心，与众同好恶，然后加之以权变。故非计策，无以决嫌定疑；非谲奇，无以破奸息寇，非阴谋，无以成功。”（《中略》）在御人之术上也运用变化之法，这一点是其他兵书很少论及的。

曹操在《孙子兵法》注中，以自己的实战经验，说明对善用变化的体会。曹操说：“势盛必衰，形露必败，故能因敌变化，取胜若神。”又说：“兵无常势，盈缩随

敌。”（均见《虚实篇》注）曹操说：“正者当敌，奇兵从旁击不备也。”（《势篇》注）曹操认为作战没有一成不变的模式，要因敌变动，应而胜之。裴松之《三国志注》引《曹瞒传》，写曹操“乃选精锐步骑，皆用袁军旗帜，衔枚缚马口，夜从间道出，人抱束薪”，火烧乌巢。曹操不厌谲诈，大胜袁绍，创造了一个巧用变化的著名战例。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对孙武、吴起等先代兵家的变化思想，有新的发展，对前人及当代的作战经验从变化的角度作了恰如其分的总结。今举一例，太宗问：“古人临阵出奇，攻人不意，斯亦相变之法乎？”靖曰：“前代战斗，多是以小术胜无术，以片善胜无善，斯安足以论兵法也？若谢玄之破苻坚，非谢玄之善也，盖苻坚之不善也。”（卷上）李靖从苻坚不善应变的角度，分析了他在淝水之战中大败的教训。

唐人李筌为《孙子兵法》作过注释，他的《太白阴经》对变化之说亦多有论述。《经》曰：“揣情不审，不知隐匿变化之动静。”（《人谋上·术有阴阳篇》）不了解敌人的变化，则难以用兵。

唐代赵蕤在其所著的《长短经》一书中，对因敌情变化而灵活应变的思想有较多的发挥，这主要体现在第九卷《兵权》中。他在分析了战国马陵之役中孙臆运用减灶之法胜庞涓和东汉武都太守虞诩用增灶之法退羌人

之后，总结说：“故曰：料敌在心，察机在目。因形而作，腾于众善而善者矣。此变通之理也。”（《变通》）同是用兵，有减灶，有增灶，敌不同，则法亦不同。

北宋何去非的《何博士备论》在剖析战例，评论军事人物时，强调运用兵法时，“不以法为守，而以法为用”；主张指挥作战时，要“出奇应变”。他肯定“曹公（曹操）之于兵也，巧譎奇变，离合出没，其应无穷。”（《汉光武论》）说明他对变化之法有深刻的认识。

南宋陈规的《守城录》，虽是一部专论守城的著作，但主张守城之法亦须变革。他说：“故事贵乎仍旧，而人惮于改作，皆不可必者……自古圣人之法未尝有一定之制，可则因，否则革也。”（《靖康朝野僉言后序》）他否定了拘于成法的旧俗，肯定了因革要依时而定的思想。

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著有《纪效新书》，他把经过实践检验的练兵原则和方法，从理论上加以总结，强调训练军队要根据形势变化而改变训练方法。书中说：“兵之贵选尚矣，而时不同，选难拘一。”（《束伍》）他认为选兵亦体现变化原则，因时而变。

《白毫子兵畧》是明人尹宾商所写的一部论述治军用兵的军事著作，其核心是用“诈”，即声东击西误敌疲敌，巧用佯攻富于变化，示假隐真出奇制胜，等等。其中的《佯》篇说道：“若夫表缓急，剂刚柔，伪为不胜

以求胜，其法在佯。佯者，暂然而不必然，似败而实不败也。其追北也，佯为不及；其见利也，佯为不知。”《变》篇中说：“良将用兵，若良医疗病。病万变，药亦万变。病变而药不变，厥疾弗能瘳也……若赵括读父书而不知变，其覆军擒将，为天下万世笑，非不幸也。”用药要随病而变，用兵须依情而化，类比贴切，通俗而又深刻。至于赵括囿于成法，纸上谈兵，不会灵活变通，难免兵败遭擒。

成于晚清的《三十六计》，以变化思想贯串全书，其中的“瞒天过海”、“围魏救赵”、“借刀杀人”、“无中生有”、“欲擒故纵”、“偷梁换柱”等计，更是在分析历史上各种战例的基础上，着重讲述用兵灵活、战法变化的战略、战术原则。

兵学的变化思想，始自先秦，讫至晚清，无不蕴含着朴素的辩证法。其中虽也有不分战争性质，不论义战与非义战的缺陷，但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可以拿来为今所用，则是可以肯定的。变化思想不仅构成了兵学的精髓，同时也丰富了辩证法的内容。